

论道

如何打响“海派红色文创”品牌

曹祎遐 郑旻涵

上海是一座光荣之城，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进一步提炼本土的海派红色文化符号，用“事业”和“产业”两种思路并行优化“海派红色文创”产业链，持续开发“文化金矿”，能够让红色文化更好植根人们心灵。



▲以“一大”元素为核心的红色文创产品 本报记者 袁婧摄

独特的文化符号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海派红色文创”就已孕育诞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背景的历史活动中，建立了一系列的艺术形象和文创产品，包括以电影艺术、戏剧曲艺、歌曲舞蹈和书籍报刊为主的传统形态，以及文化旅游、纪念品和数字产品等多种新兴形态，构成了“海派红色文创”。大量的电影人才为上海留下了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宝贵红色文化资源。新中国成立之后，多元的电影题材不断涌现，有讲述军队的《战上海》《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一部正面反映工厂生活的电影《伟大的起点》等。改革开放后更是出现了邮票、话剧、歌曲、书籍等更多文化创作形式，“海派红色文创”迎来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旅游产业为先声，红色文化资源的利用正式走上产业化路径，“海派红色文创”内涵不断扩展，旅游、影视、实体产品等多领域“开花结果”。从文艺影视发展到旅游、实体产品，从单打独斗、分散发展到多元参与、汇成燎原之势，“海派红色文创”在百年发展中内涵持续拓展，形式逐渐丰富，影响力不断增强。以红色文化为底色，以海派文化为指引，“海派红色文创”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

可持续开发的“文化金矿”

“海派红色文创”得以产生的重要前提是公众尤其是青年人对其背后蕴含的文化价值观点的认同。应通过历史人物、事件、精神等多方面分析，基于对上海发展史中党的历史、精神迹

址、党史知识有深入的了解之后，深入挖掘海派红色文化的历史价值；其次，用设计语言提炼出相关的文化符号，以人们愿意接受，尤其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唯有如此，才能使海派红色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可持续开发的“文化金矿”。既要依托于经典作品文本，又要创新戏剧、曲艺、电影、音乐等表演形式和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文创装置等艺术样式，艺术化地呈现红色上海百年风貌，使平面的经典文本立体化。上海“光荣之城”的文化象征及其丰富内涵为文创产品设计提供了素材和灵感。例如，可以围绕上海红色文化中民众耳熟能详的象征性建筑或者党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展开文创设计。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一大文创”品牌与实体商店，是近年来上海文化类场馆积极打造自有文创品牌的典型代表。在艺术表演形式的创新方面，以兼具故事性和观赏性的戏剧、电影等形式让红色历史人物故事“活”起来。上海沪剧院沪剧《一号机密》突破了传统戏剧的表现形式，以悬疑剧的解构方式，展现了早期共产党人陈达

炜的信仰与责任。在艺术样式的创新方面，与设计理念相互融合，用具象化的红色文化载体构成产品的高识别性元素，并通过多种方式的产品呈现。譬如，以石库门为代表的老上海海派建筑散发的革命气息，及其蕴含的红色文化内涵和革命历史，是传达理想信念、革命精神不可多得资源。

以现代创意要素赋能

原创的红色文化内容生产借助与科技的有效融合，更易完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形成高附加值的文创产品。如何拓宽红色文化的传播渠道？随着红色文化产品消费群体的年轻化、数字化的推广方式更易与微博、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各类网络社交平台相联动，将精选内容精准触达年轻群体；利用包括视频、动漫、游戏、VR体验、全息投影、无人机在内的多种数字化手段，将红色故事、革命历史、红色精神以智能化的方式，创造性、互动性地传达给受众，既能带来新颖体验又

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

如何打造兼具体验感、实用感和归属感的红色文创产品？传统的红色景点所采用的严肃文字加文物的展览形式容易让年轻人对红色文化产生刻板印象，产生仰望的距离。然而，融合了现代创意元素的市场化文创产品，将厚重的历史积淀转化为亲切可感的、具有高情感感染力和用户粘性的可落地产品，迎合了年轻人的消费和精神需求。基于年代、人物、街坊等历史时空中真实的要素开发出的红色课堂、红色演绎等场景文创产品，让观众置身其中“体验”红色文化。例如，剧本杀《红色恋人》将剧本杀、狼人杀、沉浸式戏剧和密室逃脱等年轻人青睐的娱乐元素融合在一起，无论从前期的采风，重现大活路、四行仓库、渔阳里等一系列上海红色地标，中期邀请影视组进行道具设计，还是到最后的游戏环节中依靠专业演员推进剧情，都力图让玩家“入戏”，体验红色文化。可见，红色文化衍生品、互动体验、展览和教育等形式更容易引发年轻人的共鸣和共情，不仅能将红色历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传递给青年消费

者，更能提供情绪价值，让年轻人有景可看有物可买，消弭了历史与当下的鸿沟，促进了代际传承和文化认同。

倡导多元主体跨界合作

在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上，各行各业通过说唱、TED演讲、沪剧、情景剧、朗诵等展演形式，展示了近年来上海基层在红色文化阐释和传播中的积极探索和实践。政府应与学界、商界、民间团体等多元主体跨界合作，完善各方在文创产业投融资和运转中的合作分工，最大程度地盘活红色文化资源，活跃产业内部可持续造血功能。

跨界合作能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提供有力支撑。由于上海红色资源多集中在市中心，这有利于连点成线，使游客连贯性地了解城市红色资源的历史与内涵，将城市红色资源视作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来开发。从历史时间跨度和革命参与主体等多角度来看，上海不同区域间的红色文化资源存在关联交叉，资源联动潜力巨大。因此，可以通过设计主题鲜明的红色旅游线路，把处于不同历史时空但反映同一主题的红色遗址串点成线，用历史故事讲解和现实场景复原历史场景。如“沪西工人运动沉浸式体验线路”就将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史料陈列馆、顾正红纪念馆、上海纺织博物馆等展馆串联起来，并通过“扎染体验”、博士实验室、“知识闯关”等丰富活动让市民沉浸式体验上海工业文明的历史文脉。红色旅游线路的设计也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参与，协同合作促进资源共享、互补。

此外，红色文化空间建设也是可行性较强的实施路径。红色文化空间营造是指从海派红色文化的IP中获取人物、故事等具有内涵的IP，进而将IP设计融入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在纪念馆、美术馆、图书馆或茶艺馆、咖啡馆等商业化场所中，将文化元素设计贯穿于立体空间布景和商品供应，激发受众关于历史与现代的文化想象，打造一个商业化运营的可供文化沙龙、学术研讨的思想交流空间。位于“一大”会址对面的“一咖啡”咖啡馆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从选址——与树德里隔街相望，选名——“觉醒年代”咖啡售价“19.21”元，到室内环境设计——复古与现代的装修风格相结合，墙面上的馆藏文物贺绿汀《游击队歌》手稿的复制件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诞生摇篮咖啡咖啡馆历史照片，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这间咖啡馆的海派红色文化渊源。

（作者分别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专家观点

在城市发展中激活文化遗产

祝碧衡

上海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传承保护，通过编制上海大都市遗产地图集、建立全面的遗产评估体系，进一步活化遗产资源，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更好融入城市更新全过程，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建设。

21世纪的大都市已成为多样化文化表现形式的实践空间。“大都市遗产”作为新形势下遗产保护与管理的一个整体的概念应运而生。目前，“大都市遗产”还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不过一般来是指一个城市中具有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或科学价值的遗产，包括建筑物、街区、地标、景观以及与城市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大都市遗产”概念提出的目的是保持这些价值的连续性，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与社区参与。

编制大都市遗产地图集

大都市遗产地图集可以是一个在线平台，通过使用数字技术来记录、可视化和叙述不同历史环境的独特特征，以详细的地图和分析性叙述为特色，为用户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城市遗产的复杂性和价值。通过强调城市遗产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支持更好地管理城市遗产。该地图集的核心是致力于强调建筑环境、自然特征和无形资产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元素共同塑造了历史城市的特征，范围超出了世界遗产名录、优秀保护建筑等。

一方面，通过系统化的调研、记录和解析，详细记录上海特色的历史建筑，包括但不限于各时期的住宅、公共建筑、工业建筑等；文化遗址归档：对上海的古镇、古寺、革命遗址等进行归档；历史街区描述：详细描述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街区和文化风貌区；自然遗产信息整合：收集并整合上海滩涂湿地、河流水域、城市绿地公园、郊野自然保护区及森林公园等自然地理区域信息。另一方面，编制地图集，包括地图设计应用：采用GIS技术，准确绘制遗产地点在大都市中的分布；内容编排：每个遗产内容配以详细描述、历史背景、保护现状等；图像资料整理：收集并整理历史与现代的照片、图纸等资料，形成丰富的视觉档案与资源数据库。

构建全面的大都市遗产评估体系

构建全面的大都市遗产评估体系，包括多维度价值评估：依据历史-文化、艺术、经济、社会等多方面价值因素，不仅评估建筑和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进行评估；按照遗产的性质和功能进行分类，便于专题研究和管理；随着城市发展和社会变化，定期更新遗产评估，确保遗产保护的时效性和相关性。结合大都市遗产地图集的发展更新，为城市规划、自然资源保护和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依据，指导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整合。

将城市遗产资源融入城市更新过程

将城市遗产融入城市更新是一种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它不仅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城市文化和历史，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一是整合规划与制定支持政策，实施基于整个区域的保护策略，包括文化景观和城市环境的综合管理。在城市更新项目的规划阶段，将遗产保护纳入考虑，确保遗产的价值得到体现和增强；将遗产保护融入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等政策中，制定和实施旨在保护大都市遗产的政策和法规，并确保政策间的协调一致。二是可持续的更新和利用，通过适应性再利用，将遗产建筑和地区转化为公共空间、文化中心、商业设施等，赋予其新的功能和生命力；采用绿色建筑和可持续设计原则进行更新，确保遗产保护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三是让当地社区参与遗产的保护和更新过程，确保更新计划符合社区的需求和期望；通过展览、讲座、工作坊等方式提高公众对城市遗产价值的认识，培养公众的共同保护与开发意识。（作者单位：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锐见

江南新民俗：传承与创新的文化融合

王晓静 吴嘉怡

的基础上，巧妙地融入新时代的元素，使其更加契合现代社会的文化需要。尽管在形式上可能有所创新，但其核心精神和文化内涵依然深深植根于传统。如上海豫园的仲春花朝节便是借鉴古代江南地区广受欢迎的“花神节”“百花生日”传统习俗，而扬州的万花会则是宋代扬州万花会的延续，是将传统习俗与现代文化巧妙结合的典范。

第二，转化类新民俗。这类新民俗并非直接源自某个具体的传统习俗，而是在吸收和借鉴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现代科技和新的文化元素，创造出的新型民俗形式。如上海南汇的桃花节与“三月三、上龙华、看桃花、逛庙会”的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嘉兴的端午民俗文化节则是把端午民俗、伍子胥祭祀、龙舟竞渡等内容进行整合创新。

第三，新生类新民俗。这类民俗活动没有直接的历史渊源，而是根据现代社会的文化需求全新创造的。如上海崇明区的白茆骑行活动，源自2019年白茆时节的“荷低碳骑行之旅——迈向可持续性未来”环保主题骑行活动。虽然其形式是全新的，但在新民俗的内容里融入了一定的传统文化元素，成为长三角地区新的社会风尚和文化现象。

这些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不仅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焕发出新的光彩，也让现代文化在历史的积淀中寻找到了根脉，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

地方认同和文旅融合的新型物质载体

新民俗不仅生动体现了民俗文化的时代特征，更是地方认同和文旅融合的新型物质载体。新民俗活动通过搭建特定的“情境”，聚集消费者、民俗文化传承者和商家，为消费者塑造了一个显性的集体人设，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发展的助力者。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互动”环节，让参与者不再是单向的表演者或观赏者，而是通过主客体的双向交流，在参与中彼此分享故事、交流情感，建立新的联系，发生情感的共鸣。

作为文化记忆的一种现代表现形式，新民俗活动是民族记忆与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为地方认同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江南新民俗活动通过代代相传的传统民俗文化知识打造了一个富有江南特色的记忆场，让参与者通过新民俗活动的场景返回历史，构建起一个属于“江南人”的共享的过去。那一刻，仿佛与祖先置身于同一个时空之中，形成了一种“共时域”，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隐藏或边缘化的记忆得以重新被唤醒和激活。

新民俗活动在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消费场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消费场景的构成要素包括消费空间、配套设施、参与人群、活动内容及文化内涵等方面。随着

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某些文化活动和文化场景正在从日常生活环境向各种文化体验场所和旅游目的地迁移。这种转变不仅激活了当地的文化生态，丰富了游客的消费体验，也为地方文化的传播和推广提供了新契机，为地方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

推动江南新民俗高质量发展

尽管“江南新民俗”是一个新兴概念，但在传播和发扬江南传统文化方面已经赢得了广泛的认可，既满足了现代人对审美、娱乐、文化和社交的需求，又促进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同时也提升了地方的经济效益，是江南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次值得肯定的尝试。为更好推动江南新民俗高质量发展，应做好以下三点。

首先，尊重地方个性，创新主题内涵。江南新民俗的发展应注意避免主题雷同，互相因袭。要在保持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注重创新和差异化发展，通过深入研究各地的历史文化背景，发掘各自独特的民俗元素及文化精神。如同样以“花”为元素，扬州的万花会可以结合芍药的文化象征，重现四相簪花的传奇故事；湖州的蚕花节可突出桑蚕文化的深厚底蕴，展现“轧蚕花”的传统技艺；上海的花朝节则可以复原古时的“赏红”“谈篋”“制花神灯”

等传统习俗。各地各自以具有深厚地域文化底蕴的内容来吸引游客的兴趣，增强文化体验的地域差异性。

其次，强化政府引导，吸纳多方力量。在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基本原则下，应有效发挥政府在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如可以通过政府牵头设立“新民俗活动专项基金”和“新民俗研究专业委员会”等，整合多方力量，为地方新民俗活动提供资金和智力支持；也可以通过各项支持政策，如减免税收、降低融资门槛、保护知识产权、简化审批流程等具体措施，来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参与，形成多元化的投资和管理模式。

最后，重视规范管理，提升服务质量。为增强新民俗活动的文化吸引力和社会认同感，需提升新民俗活动的管理和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有关部门要制定严格的管理规范，细化操作流程，对各类新民俗活动的主办方进行资质审核与监督管理，确保活动的质量和文化价值得到保障；对于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工作，增强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也要尽快建立健全的市场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各方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活动内容和形式；对于偏远或配套设施不完善的活动承办地区，应提前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条件，提升游客的满意度。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江南新民俗的三种类型

江南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新民俗的孕育与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传承传统文化精髓、吸纳和融合现代文化新鲜元素为主要形式的新民俗活动，不仅丰富了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提供了独特的文化体验，进一步推动了江南地区文化旅游的繁荣发展。江南新民俗覆盖庆典、艺术、社交和娱乐等多个领域，根据其与传统文化的关联程度，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传承类新民俗。这类新民俗是对江南传统习俗的延续与发扬。它们在保留传统民俗活动精髓